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文學史熱病

doi:10.6752/JCS.200603\_(2).0010

文化研究, (2), 200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2006

作者/Author: 黃錦樹

頁數/Page: 298-30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603\\_\(2\).0010](http://dx.doi.org/10.6752/JCS.200603_(2).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文學史熱病

黃錦樹

感謝張誦聖、邱貴芬兩位教授的熱心回應。〈無國籍華文文學〉一文初稿寫就迄今不過年餘，但不知怎的，好像已經是非常久遠以前的事了。當初寫文章時的那股熱情已隨著論文的寫就而煙消雲散了。我甚至也弄不清曾經在我身上激烈發作的**文學史登革熱**，究竟是**境外移入**的，還是**本土型**的（按：大馬仍是登革熱疫區，台灣在戒嚴時代成功的撲滅了它）。它直接觸發於2004年5月，邱貴芬教授邀請張錦忠教授與我擔任她在靜宜主辦的女性小說史研討會的討論人。那場研討會確實蠻令人感慨的，因為大部分相關論文的**文學史框架**實在缺乏新意（一點都不刺激）。而且根據我多年對此地相關學術產業的觀察，那裡頭呈現的困窘是這些年來國內相當普遍的現象。以相關學者的學術背景（多為外文系出身，擁有雄厚的象徵資本），理應可以讓台灣文學史論述更有趣才是。我當初的用心是友善的（我自己認為，不過別人怎麼想我不知道，因為文章好像寫得頗帶挑釁意味，或許是張誦聖教授說的那種公共知識分子**散文式**的職業病吧），不過是想從**華文文學**的**流寓**立場，我們自身的歷史**創傷**（煽情一點說），提供一些建言。在我們（含錦忠和建國）看來，相對而言，**馬華文學**其實要複雜得多。

一年多來，很高興看到邱貴芬教授非常積極的調整她的戰鬥位置，強化她的武裝——防禦與攻擊火力。顯然事情往好的方向發展，包括她這篇回應，續起者應可從中深深受惠。

首先要說明的是，（一部可用的、權威的）台灣文學史是當前學術產業的實際需求，因為台灣文學系所已林立於南北中，這是我的呼籲「務實」之處（並未否定書寫文學史的必要性）；而我的整體建議也很簡單，時勢如此，以台灣人文產業的豐沛能量，應該有能力把它做好，以回應需求。但迄今為止卻令人費解的沒做好，拉鋸於太早

與太晚，太簡略與太繁瑣，甚至——我猜——太愛台灣與太不愛台灣——之間。這當然是政治在做怪。不論就教學還是學術而言，都將難免會是持續的災難，因為正是不當的教育滋養偏見。

我不知道這是否過慮，或者立場過於「泛藍」。台灣文學系所的建制有它眾所周知的意識型態預設和歷史條件，和我文中批評的台灣民族主義史觀是明顯的（甚至毫不保留、毫不避嫌的）共謀，學術場域的相對自主性到底**相對自主**到甚麼程度迄今仍相當令人懷疑，而相關的意識型態再生產中最主要關鍵詞之一正是**國籍**。因此我也很好奇譬如邱教授回應文中的（開明、多元）主張，到底擁有多少圈內的盟友。但那似乎也與我無關了。用個煽情的比喻，在那綠色的叢林中，應是個如雨林般生物多樣化、食物鏈環環相扣的殺戮戰場吧。

也因此，在〈無國籍華文文學〉文**國籍**可以說是個身分的轉義 (tropes)。但它也不只是個轉義，因為這個**表皮掛滿內臟**（原諒我「現代詩」一下），**國籍**正是個眼前看來解決不了的問題——不然何以不是「中華民國·台灣文學史」而是把「·」號之前的殼子理所當然的省略？**國籍**當然無法解決文學史暴力問題，甚至可以說因它而變得嚴峻，舉馬華文學史為例正是為了說明這一點。原因也十分簡單明瞭，**所有的認同問題都不是出在自我認同，而是被不被認同**。換句話說：自我認同即使不成問題，被不被認同也還是問題。圍繞台灣這個符號產生的問題，不正是如此嗎？**亞細亞孤兒台灣**，一直到今天都還有三個持續施行著法的權威的爸爸（三座**陽具能指**），一個說美語，一個說北京話，一個說日語，不是嗎？我所言的**流寓**，正是指向這種**客觀形勢**，讓鄉土的自我認同變成另一種形式的放逐。即使**我認同我被放逐的島**。台灣文學界（或產業，或意識型態工業）對台灣文學的自我界定，真的會如邱教授引黃得時教授那般的「為學術而學術」？可以拋開前述大背景裡的**惘惘的威脅**？如果是，當然是件好事美事，值得祝福。因此我當然同意邱教授如下精闢之言：「建構類別本身的動作即已涉及論述暴力」（頁283）、「有不具身分認同的文學書寫史的書寫位置的可能嗎？」（頁284）、「文學史書寫要去除的不是史家的認同，而是避免以史家的認同作為絕對的標準來進行作品篩選與分

析」（頁284），這都該是學術共同體的共識常識兼通識。

一些細部問題幾個月前曾與邱教授往返電郵爭論，譬如台灣人=或≠華人，台灣文學究竟是否多語等等。我的常識理解是，台灣人當然不只是漢人，台灣漢人也許都帶有平埔族的血緣，未來的台灣文學當然可能是多語並陳的；但從明鄭以來，歷史現狀正是如此，漢文學獨大。台灣的漢化之深從林立的大廟小廟（從孔廟、天后宮到土地公廟）也可見一斑，連原住民漢語文學都還是晚近的發明，更別說那讀者不知道在哪裡的原住民語的原住民文學。傑出的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的原住民文學創作因此可說是長期（也許無奈的）「流寓」在方塊字形聲轉注假借的線條叢林裡。一直到目前為止，台灣文學史的主戰場還是漢語（或我慣用的，華語，華文／中文）。日語文學雖盛極一時，但隨著殖民統治及戰後的再中國化而壽終；美援經濟體下的台灣美語文學不成氣候；其他的可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僅屬於未來。弔詭的是，**文學史的暴力是具體而現實的**，譬如它一定有一個有限的篇幅；而在文學史的制度裡，作家有大小之分，作品有良窳之別，論爭有輕重之差。「凡例」既定，刀就切下去了。感性的說，總有人總有些**區塊**是碎屑。區塊大小既關乎實力，也關涉權力。國小鄉土語課程的多語惡夢（大部分地區都是獨尊閩語），多少可以讓我們看清問題的實質。

接著我想簡單回應一下邱教授對馬華文學的看法。套句說書人的套語，**此事說來話長，一言難盡**。我想（我忘了自己是否說過）簡而言之那是典型的卡夫卡處境，不能用中文（邱文：「而既然血統早已混雜，也何以獨尊『華人』（父系？）血緣命脈？這是否反映了一種父權宗族主義？」（頁283）「……訴諸『華人華語』的『馬華』概念也在『華人社群』內部複製了馬來西亞『國家文學』政策中的語言暴力。」（頁282））不能不用中文（譬如用馬來文——是否向馬來民族主義投降？用英文——自我買辦化、受殖民教育毒化？）不能寫

（寫作＝自找麻煩＝表態，向潛在的敵人挑釁）不能不寫<sup>1</sup>（緘默＝自殺，而且是**集體自殺**，俯首）。同時該爭辯的是，**史前史**並不必然預設了信史的到來，預設了它自身的結束。就馬華文學而言——這也許是最有趣的部分——史前史是一種永恆的持續狀態。就好比一般河都會流入海，但有的就滯聚在河口形成沼澤，有的流入沙漠消失不見。又好比有的河僅僅是河道，下大雨短暫的成河，雨停了它又回歸為乾枯的河道。

關於文學史寫作，其實我的興趣並不大。理由也十分簡單，寫作文學史的人必得受此**終極懲罰**：讀很多很爛而令人深惡痛絕的「文學作品」。更別說需細讀並善待自己並不喜歡的好作品（邏輯上還必須惡待喜歡的爛作品——雖私心好之，卻無法論證它是好的）。最後我想借保羅·德曼(Paul de Man)〈文學史與文學現代性〉裡的一句話來結束我**文學史熱病**的療程：

要成為出色的文學史家，就必須牢記，通常稱之為文學史者，與文學便極少或者根本沒甚麼關係；而稱之為文學釋義(literary interpretation)者，只要是出色的釋義，事實上，也就是文學的歷史。<sup>2</sup>

我喜歡的是這一意義上的文學史——它屬於閱讀史，屬於文學，屬於書寫活動。

---

1 在此項下又可加上「不能寫馬華題材」（整體而言那是窠臼；不能寫華人題材——因為無法反映整體國民處境，有種族主義之嫌），不能不寫馬華題材（否則就不是馬華文學）。

2 引自中譯，氏著《解構之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89。譯文略有更動。原文“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Modernity”出於氏著*Blindness &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3, pp.165。

## 自己的研究與文學史

任佑卿

接到評閱意見後，再讀我的論文，發現第二部分「後殖民主義、冷戰、離散」與第三部分「國族敘事與文化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確實沒有得到詳盡的論述。尤其在第二部分中提出的關於冷戰的各種問題，也應該單獨進行深入的探討。這些局限性確實源自我的各種不足之處。但是我並沒有為了證明某種學術原理而列舉了現實的問題，而只是為了解決現實的問題，借用了幾種話語。從這一點上講，我並不希望自己的主張輕易地被命名為諸如後殖民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等的某種流行話語。至少對我來講，學問是以解決具體的生活問題為目的的探索。因為生活作為深奧的混亂，不能被某一話語所完全包容。因此，我將簡單地介紹我寫題為《國族的界限和文學史》的論文的背景，以此來解答評閱意見中提出的疑問。

在二十世紀80年代韓國的民主化運動熱潮中，我接受了左派的所謂進步民族主義的洗禮。但是日後遇到的「日本軍慰安婦」問題才是我從一個女性的立場全面反省民族主義的決定性契機。我感悟到一直讓我熱血沸騰的「祖國」，我所立志實現的「祖國統一」和「民眾解放」是多麼透徹的父權想像。這使我非常痛苦，而且至今依然如此。總之在此後，如何克服作為男性中心整體主義的民族主義成為我最大的關注點。同時在思考「日本軍慰安婦」問題的解決和被害女性的超國界聯合的過程中，我開始關注這些地區所共有的經驗，也就是日本這一非西方帝國主義，進而開始思考作為單一思維單位的「東亞」，想到在女性主義中也應該需要東亞的視角。

《國族的界限和文學史》也是在思考上述問題的過程中寫成的。台灣的新文學史編撰，從幾個方面引起了我的興趣。

其一，它與當前正在韓國進行的統一文學史編撰之間有著可比

性。雖然現在的情況要比過去的80年代複雜得多。但是大多數韓國人至今還將南北統一視為民族的最大課題。而且從許多年前開始，學術界的一部分認為應對統一而思考著如何撰寫統一文學的問題。但是在一直被我認為與韓國類似的分裂國家台灣，竟然拒絕統一，並重新撰寫單獨的台灣文學史的舉動日漸成形。這對於視統一為理所當然的韓國人來講，難免是一種驚人的或新鮮的震撼。當然，那些被冷戰思考所馴化的反共主義者們自然會認為，台灣與共產大陸決裂才是理所當然的。

從我個人來講，如果南北韓的統一只能成為產生包括女性歧視在內的更多歧視的契機，就不如不去實現統一。但是至今南北韓的分裂在南北都成為民主化的絆腳石，散佈軍事主義為必然的主張，進而威脅東亞地區的和平，為美國的霸權主義提供合理的依據等等。所以現在的分裂狀況必須要克服。只是分裂的克服如果在強調民族統一的同時對無數的歧視和排斥加以合理化的民族主義的統一運動，這就絕對不應該了。我認為，這些原則在探討兩岸問題時也應該同樣適用。兩者的克服分裂（不是統一）的實踐之間具有緊密的連動性。從這一點上講，台灣的統獨爭論和台灣文學史的編撰工作不可能與我無關。

其二，也許，對於終究只是局外人的我來講，可能因為各種理由，根本無法正式參與到台灣統獨論爭當中。但是從側面探討更具普遍性且共同關注的事項，這應該還是有一些可能性。具有代表性的正是新台灣文學史的編撰。文學史作為民族國家想像的重要機制，本身誕生於民族主義慾望當中。況且正如諸多女性學者所證明的那樣，文學史以及構成其內容的所謂文學經典，一直以來基本上就是通過男性主義的價值以及為實現其價值而存在的各種文學制度所構成的。從這一點上講，追求弱勢者身分認同政治的陳芳明、邱貴芬重新書寫台灣文學史的努力，無疑是一件有趣的實驗。尤其對我來講，確實非常關注主張樹立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的邱貴芬等台灣女性學者們如何解決以往試圖解構男性中心經典和文學史的女性主義文學史家們的矛盾。

果不其然，從張愛玲現象中讀到民族主義想像的慾望，強調斷

裂的連續性戰略等，邱貴芬犀利的分析給了我許多的啟發。但是正如我在論文中仔細分析的那樣，我始終無法擺脫一種疑慮，也就是陳芳明和邱貴芬兩人為解構中心而做出的努力終究還是逐漸被另一個中心——台灣民族主義所吸收。《國族的界限和文學史》的撰寫正是這些疑慮的結果。況且我自己也無法找到可以解消這些疑慮的策略，所以這些疑慮並非她們兩人的問題，同時也是我的問題。論文的許多部分只能使用疑問句，也正是這個原因。出於這些理由，我希望《國族的界限和文學史》被讀解為一個局外人向台灣同事學者們提出的略微陳長的質疑文，而不是嚴格證明學術原理的學術論文。我期待能夠通過它來與那些力圖確立台灣新文學史或女性文學傳統的台灣學者促膝相談，共同思考，進而在台灣先行一步的經驗中找尋有效地參與數年後必將在韓國全面展開的文學史論中的智慧。

其三，應該對之所以在論文中涉及到後殖民與冷戰問題的原因加以一定的說明。我個人認為，很少有一個文本能夠像張愛玲那樣能夠為女性文學傳統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所有論爭提供豐富的啟迪。其實我瞭解台灣新文學史的編撰也是在張愛玲研究的過程中偶然得到。而且還發現，東亞地區特有的後殖民過程在以張愛玲為中心的二十世紀後半葉台灣文學史中有著相當程度的顯現。因為，張愛玲在50年代從大陸到香港，再到美國的流亡歷程，台灣文壇對張愛玲的接受過程，進而到目前台灣的新文學史撰寫論爭，這些張愛玲與台灣產生聯繫的過程與冷戰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而冷戰幾乎界定了包括中國和台灣在內的整個東亞的後殖民內容。只是在論文中確實沒能對此論點做出充分的說明。關於這一點，希望能夠在以後進行更為全面的探討。